

《大唐西域记》的文学归属^①

王汝良 鲁媛媛

摘要：除史地、宗教、民俗、中外交通等领域外，《大唐西域记》在文学领域的价值也很珍贵。研究《大唐西域记》的文学价值，首先应确定其文学归属。目前，对《大唐西域记》的基本认识主要有游记、行记、传记、报告文学、新闻文学、回忆录等。以上归类认识，各有其归类理由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均有缺憾：或者因视角单一而无法兼顾《大唐西域记》的其他特质，或者归类间互有重叠而身份难辨，或者会因传统认知对《大唐西域记》的文学价值造成遮蔽。打开视野和思路，跳出文体认识的局限，从《大唐西域记》深湛的宗教性内涵和多样的文学表现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出发，将其归入宗教文学（佛教文学）这一大的范畴，是一个较为合适的选择。这样处理，在突显《大唐西域记》自身价值的同时，可为数量众多的同类作品找到一个共同的归属，也为中国文学、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为促进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提供一个典型的范例。同时，《大唐西域记》人文意蕴较为丰富，如伦理观念、生态意识、警示意义、求真精神、理想主义、开放心胸等，将它归入宗教文学，并非是要回归传统的宗教性解读，而应着重发掘、整理和研究其宗教性内涵中有益于当下、有益人的资源，实现其现代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大唐西域记》；文学归属；宗教文学；东方文学；比较文学

收稿日期：2021-02-28

作者简介：王汝良（1973~），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教学与科研方向为东方文学与文化、中外文化关系；鲁媛媛（1995~），青岛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唐西域记》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9BWW022）的阶段性成果。

《大唐西域记》在史地、宗教、中外交通等领域的价值已受到重视和研究，但其珍贵的文学价值尚未得到系统发掘。对《大唐西域记》进行文学视角的专题

①《南亚东南亚研究》2021年第2期，第95-105页。

探讨，首先要确定其文学归属。也就是说，在大的文学类别上，应对这部作品有一个基本的定位，探讨其文体性质和学科归属。

—

前辈学者最早以游记文学来定位《大唐西域记》。季羨林曾指出，“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必须乞灵于外国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典籍最为重要，而在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游记更为突出”^①，在随后列举出的这类僧人游记中，《大唐西域记》是突出的一种。吕澂也持此观点，“中国有不少僧人、学者抱着求法的热忱到印度去游历，留下了一些游记。其中著名的有东晋法显的《历游天竺记》，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唐义净的《南海寄归传》等。其中对佛学的源流和史实，有许多极其珍贵的材料。”^②为玄奘传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进行点校工作的孙毓棠、谢方两位学者也认为，《大唐西域记》是我国古籍中“游记文学的名著”^③。不少现当代著述也将《大唐西域记》视为中古游记文学的代表作，如梅新林、俞樟华主编的《中国游记文学史》中这样评价道，“他的伟大著述《大唐西域记》不仅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记录，在史地研究上具有巨大的价值，而且，它优美流畅的文笔，简洁凝练的语言，以及它所夹杂的众多美丽神奇的风物、传说、民俗、神话等，也使它成为一部游记文学史上的不朽著作”^④，此类著述还有林邦钧选注《历代游记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夏继果和黄同华著《中国古代游记名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倪其心等选注《中国古代游记选》（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年）以及张志江编著《中国古代游记名篇选读》（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等。

行记，即“行程记”的简称，又称行纪、行录、行述等。陈佳荣等合编《历代中外行纪》将《大唐西域记》重点收录并附有详细介绍和高度评价^⑤。李德辉认为，“行记”与“游记”本有所区别，但作为行记的《大唐西域记》吸取了游记的写法，是行记与游记相融合的作品^⑥。董志翘也认为，位列“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的《大唐西域记》“在中外交通方面的记载和文学方面甚至语言文字方面的价值均不可小觑”^⑦，韩国学者林基中则评价《大唐西域记》是“叙事文学

① 季羨林：《法显》，《季羨林全集》第15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页。

②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页。

③ 慧立、彦棕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页。

④ 梅新林、俞樟华主编：《中国游记文学史》，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⑤ 陈佳荣、钱江、张广达编：《历代中外行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168页。

⑥ 李德辉：《古代行记亟待整理》，《古籍整理》，2005年第1期。

⑦ 董志翘：《大唐西域记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页。

的传说旅行记”^①。这些观点均认同《大唐西域记》是文学性较强的行记，可列入游记之中。

但对什么是游记文学，专门的探讨并不多。2009年版的《辞海》给游记下了一个较为通俗和全面的定义，“散文的一种。主要记述旅途见闻，某地历史沿革、现实状况、社会习尚、风土人情和山川景物、名胜古迹等，也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文笔轻快，描写生动。”^②王立群和梅新林也曾对游记文体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前者认为，游踪、景观和情感是构成游记文体的三个要素^③，后者则将其概括为所至、所见和所感（即游程、游观和游感）^④。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的“序”中，自言这部作品“辄随游至，举其风土”^⑤，是对自身行经中亚、南亚地区的地理、史事、宗教、语言、民俗、风土等进行的亲忆亲述。辩机所作的“记赞”中也说此书“境路盘纡，疆场回互，行次即书”^⑥，即基本以行经路线为序进行记载的。此外，作品文学色彩浓郁，作者的情感虽不外露，但潜隐于对佛国圣迹进行朝圣描摹的字里行间。在此意义上，将《大唐西域记》归入游记文学，是有其合理性的。

然而，游记文学皆因“游”而“记”，侧重于“游”的审美意识和闲适心态，这显然与玄奘往返西域的目的和心态大异其趣。主观上看，玄奘克服重重险阻，跋山涉川，前往西域，往返历经十九年，一个唯一的目的地就是赴佛教的诞生地瞻仰佛迹、寻经求法，而非游观赏玩。客观来看，《大唐西域记》所载的玄奘之行，处处显露出他对佛教圣地的虔诚和恭谨，鲜见自由自在的闲适心态。所以，前面提到的董志翘将《大唐西域记》定位为“旅行记”、李德辉将其定位为“行记”，还是比较客观的。梅新林、俞樟华主编《中国游记文学史》也这样认为：“我们虽然把《大唐西域记》作为游记来看，但它本身仍属于史地著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部宗教旅行记，并不具有游记文学的文体独立意识和自觉创作意识”^⑦。那么，又该如何理解玄奘在“序论”中自述的“辄随游至”呢？我们来看“游”的释义。《说文解字注》：“游，旌旌之流也。……旌之游如水之流，故得称流也。……引申为凡垂流之称。……又引申为出游、嬉游。”^⑧《辞

① 林基中：《关于〈大唐西域记〉和〈往五天竺国传〉的文学特性》，《韩国学论文集》，1994年第2期。

②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2页。

③ 王立群：《游记的文体要素与游记文体的形成》，《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④ 梅新林、崔小敬：《游记文体之辨》，《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⑤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页。

⑥ 同上，第1049页。

⑦ 梅新林、俞樟华主编：《中国游记文学史》，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⑧ 许慎撰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311页。

源》：“浮行为游，行走为遊，两字同音义通，古籍中往往互相通用”^①。可见，“游”字的本义是旌旗末端的装饰，引申为飘游，亦即无固定方向的行走，再后来衍生出自由自在的旅游、游玩之义。如此，“辄随游至”之“游”（本字为“遊”），自然是无固定方向的游走，而非游玩、旅游之义，这是因为，《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奉敕而作，难以想象他在给唐太宗所进献的文字中主动表露出游玩、旅游这层意思。所以，综合来看，《大唐西域记》虽然具备游记文学的某些特征，但缺乏游记的主体创作意识和审美心态，它在本质上并非地道的游记作品。

二

作为传记的一个分支——僧传，也是已有研究对《大唐西域记》所做的文体定位之一。陈引驰曾将《大唐西域记》视为“中国僧侣游学传记”^②，郭英德在《〈大唐西域记〉为什么写神怪》的讲座中和曹平在《论〈大唐西域记〉的史传笔法》一文中都曾将《大唐西域记》视为传记文学的代表，英国学者崔瑞德也认为，“寺庙维系着一种传记写作的传统，它负起了用中文撰写某些最好作品的责任”^③，这种传记传统，自然包括慧皎《高僧传》、道宣《续高僧传》、赞宁《宋高僧传》等类传和《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往五天竺国传》等个传。《大唐西域记》是僧人玄奘以第一人称视角对自身西域求法经历的记述，全书基本以行经路线为序进行记载，除佛教神话传说外，“皆存实录”^④，纪实性较强，在此意义上，将其视为一部自传性作品，并无不当。但是，有两个因素对这一定位造成困扰。一是，该自传与众多他人为玄奘所做的传记相比，不够完整和典型。玄奘是一代名僧，出自他人之手的传记颇多，仅唐代就有慧立、彦棕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玄奘传》。前者为玄奘弟子慧立、彦棕所作，以第三人称对玄奘从出生到入灭的一生予以了完整的记叙，全书共十卷、八万余字，前五卷主要是关于玄奘家世、成长经历直至印度求法前后经过的，后五卷主要是他回国后与唐太宗、高宗的交往并获得其支持从事译经事业的经过，首尾完整，层次分明，文笔典雅，是现有玄奘传记中最为推重的，“是

①《辞源》（第三版），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434页。

②陈引驰编著：《佛教文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③崔瑞德：《中国的传记写作》，《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④慧立、彦棕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5页。至于佛教神话传说，作为僧人的玄奘也将其视为史实。

我国古籍中传记文学的名著”^①，“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②。后者也对玄奘的经历予以了提炼式叙述，有头有尾，不少章节直接出自《大唐西域记》，却是以典型的他人的叙述来完成的，叙述者道宣离玄奘年代不远，真实性颇高，所以也备受推重。反观《大唐西域记》，仅限于玄奘往返西域十九年的经历，还由于受潜在读者的制约（第一个潜在的读者为唐太宗）不能有主观情感的外在流露和叙述题材的自由发挥，作为传记来说，在完整性和典型性上逊色很多。二是，传记文学是历史性和文学性的结合，并非所有的传记作品都具有明显的文学因素。在西方，传记向来不被视为文学作品^③，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这一文类还被视为“纯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形式”^④。在中国，“传记文学”的概念出现较晚，对什么是传记文学，也有很多争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传记文学》是这样界定的：“记载人物经历的作品称传记，其中文学性较强的作品即是传记文学”，这个界定简明扼要，也强调了传记和传记文学的区别，那就是“文学性较强”。但是，一个既有的现实是，大量僧传作品“可以称为‘传记’，可以当作资料阅读，但却很少有人把它们当作‘文学’去欣赏”^⑤，这就造成了对僧传作品文学性的遮蔽。另，《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传记文学》从三个方面归纳了传记文学的特征要素，其中之一是“所写的人物生平经历必须具有相当的完整性”^⑥，据此，《大唐西域记》仅限于玄奘往返西域十九年的经历，显然与此不符。所以，要深入研究《大唐西域记》的文学性，展现其文学价值，传记也并非其最佳归属。

报告文学和新闻作品，也是现有研究中对《大唐西域记》的文体定位。王文征、王洪祥《〈大唐西域记〉——报告文学的诞生》一文认为，《大唐西域记》是国内最早出现的报告文学作品，既然“报告文学是报告与文学的结合。它的内容是报告事实，而它的形式是文学的”^⑦，那么，“玄奘到天竺（古印度）取经，途经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把所见所闻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标志着我国同时也是世界最早的报告文学诞生。”^⑧王春春、王洪祥《报告文学探

① 慧立、彦棕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

③ 王成军：《传记诗学》，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第8～9页。

④ 乌尔利希·韦斯坦因著，刘象愚译：《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⑤ 韩兆琦：《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略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⑥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传记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2页。

⑦ 白润生、刘一沾：《报告文学简论》，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⑧ 王文征、王洪祥：《〈大唐西域记〉——报告文学的诞生》，《新疆新闻界》，1997年第6期。

源》^①一文重申了这一观点。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种归类，即《大唐西域记》是“我国和世界最早的国际新闻作品集”^②，持这种观点的也为上述王春春、王洪祥二人，主要依据是《大唐西域记》符合纪实性、及时性等新闻作品的特点，又是对多国多地区见闻的综述。这些观点虽不具有代表性，但从各自专业出发的定位，也给《大唐西域记》的解读提供了新颖的视角。然而，“报告文学”和“新闻文学”的概念，是近代以来随着传媒业特别是纸质传媒业的发展才出现的，报告文学“是用一定的文学审美手段与政论方法，真实、及时、形象、有针对性地报道具有特殊传播价值事实的文学样式”^③，新闻文学是“具有新闻性的、在创作发表上时效性比较强的、具有比较确凿的真实性的、带有舆论导向性质的、大多以新闻报刊为载体的文学作品”^④，二者互有关联和重叠，但它们具有两个共同要素：真实性和导向性。而这两个要素对《大唐西域记》来说，都很牵强。《大唐西域记》虽纪实性很强，但其虚幻性也不容忽视，它除对西域的史地、宗教、民俗、风物等进行实录外，还记载了大量佛教神话、传说等，这对玄奘本人和其他佛教信徒来说可能也是事实，但作为世俗读者，很难相信这是确乎发生过的事情。正因为此，清时官方组织编纂的《四库全书》和李光廷撰《汉西域图考》一方面均重视《大唐西域记》的纪实价值（佛教类书籍，两书均只收录了《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另一方面又对其虚幻描述颇不以为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评价《大唐西域记》“侈陈灵异，尤不足稽”^⑤，《汉西域图考》则称“释氏多侈灵踪，儒者喜掺异物，今并删之”^⑥。就导向性而言，玄奘虽奉敕而作《大唐西域记》，但就作品的客观内容来看，真正服务于政治的目的并不强，字里行间表现出的仍是其对于宗教的虔诚，或者说，缺乏政治导向性，宗教导向性反而非常强烈，而这，恰与报告文学、新闻文学的创作初衷背道而驰。

回忆录，主要是一种自传式作品，是对自身思想和生活经历的追忆和记录。^⑦周海婴曾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定位为回忆录，“历史上不少史料就是回忆录，甚至连《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这样的历史名著也是以回忆

① 王春春、王洪祥：《报告文学探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② 王春春、王洪祥：《〈大唐西域记〉——我国和世界最早的国际新闻作品集》，《今传媒》，2009年第4期。

③ 刘雪梅：《报告文学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④ 李白坚主编：《中国新闻文学史》，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⑤ 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1页。

⑥ 李恢垣：《汉西域图考》卷之七《附录》，台北乐天出版社1974年版，第440页。

⑦ 也有为他人所作的回忆录，如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等，但本文所谈均为自忆式回忆录。

录传世的”^①，一些历史教材中也出现此类说法。这些说法未必均是从严格的文体学意义上来谈的，但仍有一定的代表性。《大唐西域记》为玄奘求法归来后对自身经历的回忆记录，在此意义上将其视为一部回忆录，有其合理性。但同样有两个不适宜因素。一是，回忆录是对忆主本人生活经历、思想变化的记载，主体性比较强，但《大唐西域记》是奉敕而作，第一个潜在读者是唐太宗，所以作品中绝少主观情感的流露，基本是对史地、宗教、社会、风物等的客观记述。这不同于《法显传》，法显是应同吃同住的僧人之请，对自身求法的经历进行回忆记述的，作品中多有自然的情感流露和心态表现。二是，若将《大唐西域记》定位为单纯的回忆录，对其文学性也会造成遮蔽。荷兰学者安·约里斯曾视回忆录为文学的“简单形式”，美国学者乌尔利希·韦斯坦因则称之为“前文学体裁”。之所以冠之为“简单形式”“边缘形式”或“前文学体裁”，是在于回忆录一般不具文学性，只有将其“插入日记或自传中时，才有文学性”^②。而在中国文学的文体分类中，回忆录普遍缺席^③。在此意义上，《大唐西域记》内容深湛，形式多样，文学价值较高，作为回忆录也不典型。

三

从以上分析可见，游记、行记、传记、报告文学、新闻文学、回忆录等，各有其归类理由和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均不能令人满意：或者因视角单一而无法兼顾《大唐西域记》的其他特质，例如，有观点认为《大唐西域记》“看上去像是‘游记’，实质上又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④。或者互有重叠而身份难辨，如游记与行记，传记与回忆录，报告文学与新闻文学。或者会因传统认知对《大唐西域记》的文学价值造成遮蔽，如行记、回忆录、方志等^⑤。如此，打开视野和思路，从《大唐西域记》深湛的宗教性内涵和多样的文学表现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出发，将其归入宗教文学（佛教文学）这一大的范畴，是一个较为合适的选择。

宗教文学，对其内涵和外延的把握，国内外学界理解不一。具体到佛教文学，也有不同的界定和理解。日本学者加地哲定坚持狭义的佛教文学观：“所谓

① 周海婴：《回忆录蕴藏历史价值——读〈梅志文集〉有感》，《人民日报》，2008年1月31日。

② 乌尔利希·韦斯坦因著，刘象愚译：《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112页。

③ 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未收录“回忆录”，对这一主题的中国知网数据库查询结果也几乎尽为国外成果。

④ 陈飞、凡评：《新译大唐西域记》，台北三民书局2015年版，第22页。

⑤ 游记、行记、传记、报告文学、新闻文学、回忆录，皆可视为副文学作品。方志，一般不被视为文学或副文学作品，故本文未进行讨论。

佛教文学，是以佛教精神为内容、有意识地创作的文学作品”^①，按此，《大唐西域记》显然不在此列，因为玄奘并非是在有意进行文学创作；不单是《大唐西域记》，文学性较强的大量佛经作品也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显然也不是出于主观性的文学创作。国内学者大多从广义上对佛教文学这一概念进行理解，黄宝生、孙昌武、侯传文等将大量可读性较强的佛经作品纳入佛教文学范畴，普慧将汉文佛教文学分为四个组成部分：汉译佛典之文学、中国僧尼创作之文学、世俗文人崇佛之文学、华夏民间佛教信仰之文学。其中，“中国僧尼创作之文学”具体包括诗词、偈颂、语录、序跋、题记、碑铭、论议、行纪、传记等^②，他显然关注到了《大唐西域记》在内的同类作品，范畴中后两种“行纪”和“传记”，与前述所论《大唐西域记》的已有文体定位是对应的。陈引驰也认为，《大唐西域记》《法显传》等作品，“一方面是佛教流行的史料，另一方面也是佛教文学的组成部分”^③，他和陈允吉合作主编的《佛教文学精编》甚至选入了敬播为《大唐西域记》所做的“序”，因为该序言是佛教文学中骈散结合的佳作。高华平也将“中国佛教僧侣文学”视为佛教文学的重要部分：“中国古代的佛教高僧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他们笔下的文章，即使是谈论佛理的辩论性文字，往往也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中国佛教史上不仅产生过释道安、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等著名的佛典翻译家，而且还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诗僧’、‘文僧’、‘学问僧’等。他们也为后世留下了大量不朽的文学作品。如释法显的《天竺游记》(又名《法显传》《佛国记》等)、僧肇的《肇论》、刘勰的《文心雕龙》、慧皎的《高僧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他们的作品，可以说最大程度上做到了‘佛教精神’与文学形式的融为一体，因而无疑应该成为‘中国佛教文学’的主要内容”。^④

具体来看《大唐西域记》的宗教性和文学性。《大唐西域记》为玄奘奉敕而撰就，主观上是为配合唐太宗了解西域情况而作，但客观上看，高僧玄奘仍赋予其突出丰厚的宗教意蕴，问世后不久即入典佛藏。它记载了大量的佛本生故事、以“八相成道”为代表的佛传故事，诸菩萨、罗汉传奇，护法名王（阿育王、迦腻色迦王、戒日王、鸠摩罗王等），著名论师（戒贤、觉贤、胜军、如意、世友、世亲、无著、众贤、马鸣、龙猛、德慧、马胜、童授、清辩等）故事，佛教的重大活动（结集、无遮大会、行像等）和佛教圣迹（王舍城、那烂陀寺、菩

① 加地哲定著，刘卫星译：《中国佛教文学》，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② 普慧：《佛教文学研究五题》，《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③ 陈引驰编著：《佛教文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④ 高华平：《中国佛教文学的概念、研究现状及其走向》，《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提伽耶、鹿野苑古刹)等。其中,对七世纪之前大、小乘的分布传播情况和佛教内外论争(内部的是指大乘小乘之间、大乘空宗有宗之间及其他各派别之间的分歧,外部的主要是指佛教同印度教、耆那教、袄教等的冲突)以及几次佛典结集情况的记载,学术史价值极高。除印度外,《大唐西域记》对广义中亚地区(含今天葱岭以东新疆境内)佛教分布情况的记载同样珍贵,对中亚佛教史研究的意义同样重要。总之,可视《大唐西域记》为一部隐性存在的糅合佛教史实与传奇、既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的西域佛教史著作,“其地位在佛教史、佛教地理研究上,允为无二之宝典”。^①还应注意的是,《大唐西域记》中对以上宗教状况的叙述是客观的,基调是冷静和内敛的,然而,作品所内蕴的宗教情感和大乘情怀却是丰富、充沛和深刻的。如卷第六记载:

执金刚神密迹力士见佛灭度时,悲恸唱言:“如来舍我入大涅槃,无归依,无覆护!”毒箭深入,愁火炽盛,舍金刚杵,闷绝躃地。久而又起,悲哀恋慕,互相谓曰:“生死大海,谁作舟楫?无明长夜,谁为灯炬?”^②

这段叙述,与其说是在表现密迹力士的悲恸,不如说是在表现玄奘自己的心境,他借密迹力士之口,以大海中失去舟楫、长夜里失去灯炬作喻,把对如来的恋慕和不舍表现得淋漓尽致。因缘际会,在玄奘示灭之后,唐高宗李治也曾以极其相似的诗句,表达对高僧玄奘的哀思:“苦海方阔,舟楫遽沉;暗室犹昏,灯炬斯掩!”^③

再如卷第三对“舍身饲虎”这一本生故事的记载:

从此复还呾叉始罗国北界,渡信度河,东南行二百余里,度大石门,昔摩诃萨埵王子于此投身饥饿乌椽。(音徒。)其南百四五十步有石窠堵波,摩诃萨埵恣饿兽之无力也,行至此地,干竹自刺,以血啖之,于是乎兽乃啖焉。其中地土洎诸草木,微带绛色,犹血染也。人履其地,若负芒刺,无云疑信,莫不悲怆。^④

高僧玄奘意志坚定、冷静自制,《大唐西域记》又是奉敕而作,极少有作者

^① 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页。除佛教外,《大唐西域记》中还多处提到婆罗门教、耆那教、袄教的情况,甚至涉及密教和印度民间宗教怛特罗教,这都是进行中古期东方宗教研究的宝贵资料。

^② 慧立、彦棕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546页。

^③ 同上,第225页。

^④ 玄奘、辩机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17页。

情感的自然流露，但从他对这一著名本生故事的简洁、平静叙述中，仍能体会到他对舍身奉献的理解笃守和对佛陀的追慕怀念。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伴随玄奘有形的足迹，读者总能深切地感受到沉潜于文本之下的无形的信仰，两股线索，一显一隐，不只是带领读者了解了一些佛教知识、梳理了佛教发展的脉络，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作者玄奘于简练质朴的叙述下那充溢的宗教情感。

《大唐西域记》的作者玄奘和编订者辩机具备一定的甚至较高的文学素养，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大唐西域记》，文学体例完备，叙述技巧卓越，人文价值深湛，文学价值极高。从体例上看，《大唐西域记》包含了神话、史诗、小说、戏剧、散文等多种文体要素：它所记载的诸多佛教神话和世俗传说，题材广泛，想象丰富，描述生动，可视为一部小型的文学原型库；它对沿途国家开国传说的记载，有不少可与这些地区的史料记载互相参照，如卷第四记载的萨他泥湿伐罗国就被众多研究者认为就是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战斗发生地。《大唐西域记》记载了大量宗教故事和世俗故事，人物形象鲜活，情节曲折多变，又时有玄奘所做的改编，可当作一部趣味性极强的东方小说集来进行阅读。其中，卷第三记载的阿育王爱子的故事最为典型，该小说故事性、历史性兼具，沉冤昭雪、善恶有报，体现出东方小说文体的显著特色和固有模式。《大唐西域记》中不少对佛教与外道之间的斗法故事的描述，情节紧凑，冲突明显，动作和对话描写运用得当，含有鲜明的戏剧因素，非常适合舞台演出，如卷第五所记提婆菩萨降服外道、曲女城法会，卷第十所记龙猛菩萨降服外道，卷第八所记马鸣菩萨降服外道，等等。^①此外，《大唐西域记》通篇采用散文体，有些篇章被选为优秀的散文作品^②。从叙述技巧上看，《大唐西域记》虽非出于有意的文学创作，但其语言的平实质朴，形式的韵散结合，譬喻、对比与铺排等手法的运用，正写与侧写、实写与虚写、详写与略写的结合，以及整体风格上的优柔明净，等等，都令人印象深刻。台湾学者陈飞、凡评曾言：“《大唐西域记》不仅完全有理由进入‘文学’的殿堂，而且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一块瑰宝，是一部优秀的文学杰作。它除了具有历史学、地理学、哲学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外，在文学上，它同样应具有崇高地位：它的叙事，它的写人，它的抒情和明理，以及它的艺术风格，都给人以优美的文学享受和强烈的艺术感染。”^③的确，丰富深湛的宗教性内涵，与如此卓越多样的文学表现相结合，成就了这样一部优秀的宗教文学佳作。

将《大唐西域记》归入宗教文学，既是作品自身的性质决定，又有其重要意

① 见王汝良、梁靖茹：《〈大唐西域记〉文类特征辨微》，《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1年春之卷。

② 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古文荟萃》即选入了《大唐西域记》卷第一记载跋祿迦国的文字，并有高度评价。

③ 陈飞、凡评：《新译大唐西域记》，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6页。

义。首先，它的加入，充实了佛教文学大家庭，改变了这部中古要籍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缺席状况，为全面认识这部作品和同类作品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古代典籍中与《大唐西域记》类似的作品众多，如《法显传》《往五天竺国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唐大和上东征传》等，均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但并未受到重视和研究。在此意义上，将《大唐西域记》定位为佛教文学作品，为数量众多的同类作品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归属，在突显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为中国文学和东方文学拓展出新的研究空间。其次，《大唐西域记》是异域宗教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在保存和传播域外文学文化、促进中外文学文化交流方面，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诸多故事，或由故事的叙述者玄奘亲历，或原本在故事的发生地口耳相传，经玄奘亲闻后，再经《大唐西域记》以文本的形式留存下来，先在中国，后在整个东亚文化圈内进行传播。如，卷第七所载的“烈士池”故事，这个本源于印度民间的传说，经《大唐西域记》传播至中国，又传播至日本、朝鲜，形成了东亚文化圈的一个独特题材，从中可梳理出“印度→中国→日本、朝鲜”这一清晰的传播脉络，传播期间也发生了一些改编和变异，成为贯通四国文学和南亚、东亚两大文化圈的典型范例。^①从传播的方式上看，“这些印度流传的佛教故事进入中国为人所知，通过的是文本经典传译之外的另一条途径：记录口述的途径”^②，较之于传统的译介途径，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新的有益补充。第三，将《大唐西域记》归入宗教文学，并非是要回归传统的宗教性解读，宗教文学的核心是文学，而文学是人学，现代人研究宗教文学，应着重发掘、整理和研究其宗教性内涵中有益于当下、有益人的资源，为我所用，为今所用，实现其现代意义和价值。在这方面，《大唐西域记》所蕴含的佛教伦理、生态观念、警示意义、求真精神、理想主义、开放心胸、大乘情怀等，值得进行深度阐发和研究。^③

[责任编辑：李丽]

① 见王汝良：《影响与变异：〈大唐西域记〉所载“烈士”传说与后世杜子春故事》，《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第十一辑，2015年。

② 陈引驰编著：《佛教文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③ 见王汝良：《〈大唐西域记〉的人文价值》，《东方论坛》，2019年第4期。